



提起中国古代音乐，你会想起什么？

是金声玉振的庄严，是高山流水的超逸，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是“何人不起故园情”的幽婉……

在19世纪留声机发明之前，世界上没有保存音乐的手段。但乐器作为实践音乐活动的物质媒介，是可以保存、流传的，乐器史就是一部物化的音乐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举办“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展示馆藏精品及向多家文博单位商借的文物共计200余件（套），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骨笛、唐代九霄环佩琴、清代十二律管等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乐器珍品，系统反映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突出展现中国传统音乐辅德化、养性情、娱民众的文化价值。

左图：贾湖骨笛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走进国博“天地同和”展

古代乐器，拨动你的心弦

本报记者 邹雅婷

见证中国音乐史的悠久

走进展厅，悠扬的乐曲声袅袅回荡。策展人诸葛英良介绍，这是专为展览创作的主题音乐《天地同和》。入口处的地板上有一只凤凰投影，象征古代奏乐时“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盛景。高台、斗拱、屏风等中国古建的空间布景和室内设计元素，营造出浓郁的古典文化氛围。

“这是一场策划很久的主题展，经过多次专家研讨，得到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东沂南北寨画像石墓博物馆等单位支持。”诸葛英良对记者说，“天地同和”展不同于一般的古代文物展，在展览内容、展陈形式上做了一些新尝试，希望让观众静下心来体会中国音乐文化之美。

展览分为四个部分：“鹤鸣九皋，声闻于天”“钟鼓铿锵，大音至乐”“丝竹相合，妙音飞花”“云间锣鼓，日月同辉”。通过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反映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演变的历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田青是展览的学术顾问之一。“展品的珍稀度、可看度都很高，有不少难得一见的文化瑰宝。”田青说，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中国音乐史，从音乐的角度感受中华文化的悠久、绚丽、伟大。

展厅里第一件展品是1986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这支骨笛由鹤类尺骨制成，有七孔，表面光滑，制作精细，孔间和孔上方均有钻孔前刻划准确的记号，证明当时制作骨笛经过相当准确的计算。专家对同批出土的骨笛进行测试发现，骨笛音质较好，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可以演奏较为复杂的旋律。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之一，属于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800年的裴李岗文化。“我们说中国的音乐史有8000年到9000年，就是因为贾湖骨笛这一批文物。”田青对记者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贾湖骨笛已陆续出土几十支，大多保存完整，音阶很全。它们的发现不仅把中国音乐史往前推了几千年，对于世界音乐史也意义非凡，刷新了人们对音阶最早形成时间的认识。

述说礼乐文明的辉煌

上古时代，音乐不单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还具有在祭祀中营造仪式氛围的功能。项阳告诉记者，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等早期宫城性遗址出土的乐器，作为祭



商代妇好墓鸱纹特磬

邹雅婷摄



西周四虎钟

邹雅婷摄



“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现场

杜建坡摄/人民视觉

祀时的演奏用具，反映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滥觞。

展厅里有一件石峁遗址出土的口簧，由牛肋骨磨制而成，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据介绍，石峁皇城台共发现20余件骨质口簧，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此类乐器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与口簧一起出土的还有骨笛、骨管哨、陶球哨等，这么多乐器的出现，彰显了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宫城区的地位和性质。

《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自青铜时代起，以礼乐重器应和宗法制度、区分身份等级的礼乐文明逐渐形成。“《周礼》中概括了古代‘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礼的很多仪式需要搭配相应的音乐，通常是歌、舞、乐一体。”项阳说。

先秦至汉代，随着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乐器更加复杂化，出现了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从商代兽面纹大铙、西周四虎钟、夔龙纹编钟，到春秋魏太子墓铜铎、战国淹城句铎、汉代虎钮浑干，可以看出青铜乐器的发展脉络。

展厅里的多媒体互动设备展示了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形制和结构。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先秦礼乐文明的最高成就。从屏幕上可以看出，这套编钟分三层悬挂在钟架上：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甬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2组大型长枚甬钟，12件，另有大镈钟1件。每一件钟都能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整套编钟可以演奏很多乐曲。点击屏幕上的“奏乐”按钮，还能听到曾侯乙编钟演奏的《春江花月夜》《东方红》等乐曲。

在金石乐悬成为礼乐重器的同时，以琴、瑟为代表的弹弦乐器产生，弹琴奏乐成为文人雅士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中展出了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西汉马王堆1号墓瑟。出土时瑟的25根丝弦完整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25个拱桥式木柱也保持在原位。它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唯一上古瑟调弦实例，为古代乐器研究提供了宝贵物证。

展现文化交流的多彩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流日益扩大，外来乐器广泛应用于各式演奏场合，诗歌、壁画等艺术作品记录了“胡琴琵琶与羌笛”的繁盛景象。

展厅里展示了唐代的铜铙，这种西域传来的乐器，自隋唐以来在宫廷燕乐中广泛使用。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大忽雷，是唐代音乐家韩滉参考西域曲项琵琶的形式创制而成的两弦乐器，因其发音忽忽若雷而得名。它曾藏于深宫之中，后流入民间，20世纪50年代入藏故宫。

展览中还有不少乐俑，生动再现了古代演奏乐器的情景。西安插秧村唐墓出土的一组乐俑，为6名男子组成的乐队。乐俑均着圆领袍、裹幘头、系腰带，面颊丰满，盘坐或跪坐演

奏，所执乐器有竖箜篌、拍板、横笛、排箫、琵琶和笙。李贞墓出土的三彩骑马乐俑，造型生动逼真，釉色鲜艳，人物手持乐器包括排箫、铜铙、鼓槌等。专家介绍，考古发现的隋唐乐舞俑数量很多，风格自成一体。其乐器的组合、形制、种类和数量，乐人的服饰、发式、造型、神情和演奏姿态，均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唐代九霄环佩琴是此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此琴为典型的伏羲式，琴面浑厚呈半椭圆形，原漆为黑色，露朱漆地。琴为桐木所斫，做工圆润不露棱角。通过琴腹上的铭文与文献资料可知，此琴原为宋人冯铨藏品，后经南宋鉴藏家周必大鉴定为唐代制琴世家雷氏族人斫制。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髹漆工艺，国博馆藏的这件九霄环佩琴皆堪称唐琴的典范之作，为唐琴的断代与鉴定提供了标准器，也为探究唐代斫琴工艺提供了标本。

宋元之际，戏曲艺术正式确立并不断发展，乐器的运用和改良达到新的高峰，以马尾胡琴为代表的弓弦乐器进入主流音乐体系。明清两代戏曲、歌舞、说唱等包含音乐元素的艺术样式日益繁荣，孕育了生动多彩的民间艺术成就。展厅里的双清、拍板、三弦等，均为常见的戏曲伴奏乐器。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示了不少20世纪以来的改良乐器和新乐器。“这些展品是为了告诉我们，中国音乐一直在传承、创新中发展，古人的智慧与创造为现代人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诸葛英良说。



唐代李贞墓三彩骑马乐俑

范立摄

“荷浦珠还——荷兰倪汉克新近捐赠文物展”日前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集中展示荷兰收藏家倪汉克近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青铜器、陶瓷器和牙雕精品等珍贵文物54件。展览名称借成语“合浦珠还”之谐音，寓意倪汉克与上海博物馆因文物的归来来兮而结下深厚情谊。

倪汉克是荷兰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受家风濡染，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情有独钟。在2008年、2018年和2019年，倪汉克先后3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其收藏的中国陶瓷、青铜和牙雕文物等总计150余件，年代自商代至明清，跨度近3000年。这批文物进一步充实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并填补了相应门类的阙漏，具有一定的艺术、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倪汉克曾表示：“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最有序运营的博物馆之一，我选择它作为捐赠对象顺理成章。现在我把我的藏品托付给上海博物馆，相信它一定能好好地照顾、保存这些非凡的器物，并让大众得以体验欣赏的乐趣。”

此次展出的文物中，一件汉代绿釉陶烤炉颇为引人注目。陶炉通体施绿釉，炉上架有两枚烤签，签上各置4只蝉，底部有长方形漏灰孔数道。“这说明汉代的烹饪技法除了蒸、煮、煎等，烧烤也颇为流行。”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陈浩介绍，汉代画像石上常出现烧烤的画面，如山东诸城凉台汉墓出土的“庖厨”画像，就有厨师在方形烤炉前烤肉串的形象。不仅是烤肉，烤蝉、食蝉在当时也很常见，曹植的《蝉赋》中就有描写烤蝉的句子。

除了陶烤炉，展品中还有陶灶、陶井、陶磨坊、陶猪圈、陶水塘等。这些均为随葬明器，通过它们可以管窥汉代人的生活。

此次展出的青铜器有爵、觚、鼎、簋、缶等多种器型，还有钮钟、铜铃、芒鼓等乐器。“大万父辛爵”是一件有明确著录的文物，原藏于美国纽约，在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中有记载。这件铜爵年代为西周早期，釜下有铭“大万父辛”。“万”为从事乐舞之人，“大万”为“万”之官长，“大万父辛爵”即“大万”为“父辛”所制。

清代象牙雕七层宝塔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全器综合运用镂刻、圆雕、拼镶等多种象牙工艺技法，雕刻精细，打磨光滑，形制文雅，具有晚清时期南派牙雕器物的典型风格，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工艺水平。该宝塔入藏上海博物馆后，经专业人员的精心修复与科学保护，如今已重焕光彩。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汉代绿釉陶烤炉

上海博物馆供图

◎家风家训

冯友兰家风：崇文重教 心智兼修

谷敏

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名言，如果把儿童比作大理石，那么将大理石变成雕塑需要家庭、学校等多个雕刻家的参与，其中，家庭的作用是在第一位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那些人才辈出的家族，往往有着累世相传的优良家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族。

冯友兰先祖冯泰原籍山西高平，冯泰之子冯瑛后迁至河南南阳唐河，以经商为业。及至冯泰五世孙冯玉文时，冯家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家族。清光绪年间，河南大旱，冯玉文竭尽全力赈济灾民，并为无力安葬者广施棺木，赢得当地百姓赞誉。冯玉文在家中多处悬挂“耕读”牌匾，并写下“富贵何足荣，清贫岂为苦”之诗句，希望后代都能成为踏实进取、品德高尚之人。冯玉文的长子冯云昇、三子冯汉昇均为秀才，二子冯台昇考中了进士，他就是冯友兰的父亲。

冯台昇有5名子女，除早夭的长子、早嫁的长女外，还有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三人。冯友兰兄妹幼时，正逢清末，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对传统教育理念产生巨大冲击。冯台昇认为，作为中国人，不管将来学什么，都应该先把中文的底子打好。在父亲的安排下，冯友兰6岁进入私塾，从《三字经》《论语》《孟子》开始，系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冯台昇曾在武昌的外语学堂工作，他不仅在家中教孩子们唱学堂歌，还亲自为他们编写教材。他编写的《山泉斋舆地学讲义》，既介绍中国地理，又介绍世界地理，极大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在湖北崇阳任职时，冯台昇又推荐子女阅读介绍国际形势的《外交报》。这种中西结合的教育，为冯友兰兄妹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8年，冯友兰13岁时，冯台昇因病去世，年仅42岁。此后，母亲吴清芝独自挑起家中重担。冯友兰曾感叹说：“母亲是我一生中我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人。”吴清芝性格乐观坚韧，她告诫孩子们，人最怕的就是整天忧心忡忡，因为“忧最伤人”，心情愉快是身体健康的基础，故而人生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学会振作精神。

冯友兰回忆，母亲“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当时家中没有钟表，为培养孩子们的时间观念，吴清芝督促孩子们学习时，会划线条于地，标注日影，“影至某线休息，至某线读书写字，皆有规定”。1910年，唐河县兴办的女子学堂聘请吴清芝担任监学。为鼓励当地民众将家中的女孩送到学堂来，吴清芝将自己的女儿冯沅君、媳妇吴淑贞带到学堂就读。在她的带动下，很多女孩都来上学。晚年的吴清芝对孙女冯钟芸说：“有人说女孩子不必多读书。我说，男女都是人，女孩子要争这口气。”

在父母的教导和影响下，冯友兰三兄妹都考入北大，又先后留学海外。冯友兰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家，冯景兰是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冯沅君则是作家与文学史专家。

据研究者统计，冯氏家族自冯友兰所在的七世起，至九世止，共有博士十余人，大学学历者六十余人，其中有40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级名校。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冯钟璞）为知名作家，儿子冯钟越是中国第一代飞机结构强度专家。

宗璞回忆父亲冯友兰时说：“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是一心一意专注于事业，其他功名利禄都是云烟。他也告诉我们：在任何苦难面前都保持一颗泰然自若的心，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真正的幸福自在、问心无愧！”

（作者为成都行政学院副教授）

上博展出荷兰藏家捐赠文物

本报记者 邹雅婷